

懷本而踏實的教育尋根者

——伍振鷺

(訪問及資料整理：鄭玉卿、吳美玲、梁淑惠)

壹、生平簡介

伍振鷺先生，字毅夫，出生於民國十八年九月七日，江西省九江縣人。出身書香門第，自幼至中學階段接受良好的教育。早年歷經戰亂時期的顛沛流離，民國三十八、九年間，在好友協助下隻身來台，進入台灣師範大學就讀，並繼續攻讀碩士學位。研究所畢業後，於台灣師範大學歷任助教、講師、副教授、教授，從事教學及行政工作。民國五〇年間，赴英國倫敦大學進修，在生活體驗與學術研究上皆有所心得，歸國後擔任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系主任、教育研究所所長等職，為教學與學術研究奉獻心力。曾編著中國教育思想史等重要教育專著，並參與教育大辭書之編輯工作。民國八十六年，於中國文化大學創立教育學系，兼教育學系主任以及教育學院院長，延攬名師，認真辦學，頗受到讚譽，現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名譽教授。

學歷
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士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碩士
英國倫敦大學研究

經歷
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助教
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講師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副教授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授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系主任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
中國教育學會理事長
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理事長
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兼教育學系主任
中國文化大學教育學院院長

座右銘

~誠實、規矩、踏實~

~從事教育工作或學術研究，都要一步步的、踏踏實實的~

貳、家世及早期教育

.....

初見伍振鷺先生，和藹的笑容，親切的態度，與這樣一位氣度雍容的長者深談，實是人生一大樂事。

伍振鷺先生首先與我們談到了他年少時期的生活與求學經歷。戰亂時代的顛沛流離，對我們而言，只是歷史教科書上的片段，但卻是他生命中的沉重記憶，他談道：

「就家庭背景來講，也算是書香門第。我家在鄉下有很多田地，等於說是地主，將田地交給佃戶種。可是戰後就不行了，第一個是原來的體制被破壞了，另外就是收租也比較困難。尤其到了勝利以後，大陸上鬧國共戰爭，大家認為是共產世界，那更是收不到租，後來只好將田地賣掉了。從七七抗戰一直到民國三十八年撤退到台灣這段時間，生活非常的苦，不過雖苦，至少我們還是有機會上學，家裡總是排除困難，讓我們有機會能夠受一點教育。」

從他對自己在大陸求學時期的敘述裡，可以感受到先生家人對他在接受教育方面的重視，使他有機會能受到良好的初等與高中教育，他談道：

「我從小學到中學都是念教會學校，這些教會學校類似英國公學的傳統，是屬於私立學校。當年來講，大抵公立學校不如私立學校，好的中學都是教會學校，大

學也是，好大學都是私立學校、教會學校。那時公立學校不像台灣，到了台灣以後才是公立學校超過了私立學校。過去大陸上教會學校都有很長的歷史，學校的水準也很高，像我念的教會學校，在清朝同治年間就設立了，已經有一百四、五十年的歷史了。」

伍振鷺先生高中畢業那一年，大陸正爆發國共戰爭，那些日子對他而言，可說是一段輾轉流離的苦難遭遇，也是一連串不得已的抉擇，他回憶著說道：

「戰爭爆發後，我們就撤退。我們家在江西，靠長江以南，就往江西南部走，走到贛南，那時候家兄說：『解放了，回不去了，怎麼辦呢？』，就往廣州考學校好了，到廣州……又回不去了，是一步步逼著我往前走。」

伍振鷺先生這段用血淚交織而成的年少記憶，是許多年輕的學子們所不曾體驗過的，我們是何其有幸的一代，更是應該懂得惜福與感恩的一代！

參、大學生活

民國三十八、九年期間，伍振鷺先生在高中同學的幫助下，隻身來到台灣。當時台灣到處是層出不窮的亂象，生活條件也很差。他回憶起自己初來台時所面臨的難題與想法：

「那時候之所以選擇師範學院，原因是戰亂關係，我一個人流亡到台灣，受教育要有一些條件。當年師範學院，有公費，也可以住在學校，畢業以後，工作有保障。」

對於自己後來進入師範大學的求學經驗，他則感嘆地說：

「當年到師大來，條件都很差，師大圖書館書也不多，你想借書，大家也都想借，常常都借不到，所以大部分上課都是靠作筆記。而且那個時候，生活都很窮困，所以有的時候要去做做家庭教師，才能維持生活，可以說是生活非常地艱苦。條件也不好、生活艱苦，因此我覺得大學四年，事實上自己事後檢討的回憶，實在是所得很有限，那些筆記記完後，因已多年，之後便遺失了。」

伍振鷺先生打趣的說，自己大學生涯是「混」過去的，真正體悟到要專心研究學問，則要到研究所階段。

肆、感懷師恩

伍振鷺先生與我們分享他在師大研究所求學，以及擔任行政工作的經驗時，提

及了四位日後對他有深遠影響的師長。

一、師大教育研究所求學階段

憶起求學生涯，伍振鶯先生認為大學四年所得有限，直到進入研究所，才真正開始學作學問、投入研究。在這段期間內，他最感念的是黃建中先生的教誨，黃建中先生的博學廣識，以及嚴謹的治學態度與方法，皆對他日後在研究學問方面有很大的啓迪。他在描述黃建中先生時，讚嘆與堅定的語氣，流露出他對黃先生的景仰之情：

「黃先生的專長領域是在中國哲學，還有倫理學。他研究中國哲學，並接受西方的啓迪，他在愛丁堡、在劍橋，受過西洋哲學的訓練，所以他研究中國哲學，也懂西方哲學。因此，他不像有些人研究中國哲學，卻沒受過西方哲學的訓練，概念不太清楚、架構不對、方法也不好。我們的確有很多研究中國哲學的人，缺少西方哲學的思想。不可否認的，西方哲學的方法比我們好，人家有它的架構，概念也很清楚。事實上，即使你站在中國哲學裡面，卻沒有西方哲學的基礎的話，也搞不清楚。黃先生在大陸上就已經是名教授了，他的比較倫理學當年出版真的是轟動一時啊，比胡適的中國哲學史還要叫座！……當年馮友瀾寫中國哲學史，那篇論文沒人敢審查，他那個時候剛好在教育部作高教司長並代理次長，他對這個論文寫了八千字的審查報告，值得你們去看看！」

接著，他回憶起黃建中先生指導他寫作論文的情形，提到：

「黃先生指導論文是很嚴格的，有毛病必改，有寫錯的地方他都會一一勾出來。書查得不對，他會告訴你再查；假使你查不到，他再告訴你。其實他也知道你應該查什麼書，但是他先不告訴你，叫你查，你說查不到，他再跟你講，他就是這樣，很耐心地指引你直到完成論文為止，他的基礎深厚啊！所以，可以說我在整個求學過程當中，深受黃先生那種精神和方法的影響！」

伍振鶯先生稱道黃建中先生深厚的學理知識、融貫中西的眼界，以及求真求實的為學態度，也提到了自己從黃先生的教導中所獲得的啓發與心得。後來，黃先生去世後所留下的許多論述與文稿，在他的編輯彙整下，而成「文教與哲學」、「教育哲學」等專著。

二、行政歷練階段

在師範大學從事行政工作及任教期間內，也有三位跟伍振鶯先生關係密切，在做人做事的態度上值得稱道與學習的師長，一位是楊亮功先生，一位是田培林先

生，另一位是劉真先生。他稱許楊亮功先生對待晚輩的用心、謙和態度時說道：

「楊先生做人真是非常之周到！他很多事情大部分是我替他辦的，替他改了卷子、出了題目、監了考，他一定要請吃飯，吃完飯後還開車送我回家；他寫的任何文章、出書，他一定會送一份給我，而且一定是非常客氣的，雖然他是老師的身分，還是一定在題詞中寫上『振鷺兄』。」

田培林先生判斷事理的正確與效率，也在他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：

「田先生他是德國式的訓練出來的，所以他在學術上很嚴謹，不太輕易的下筆，要寫就是要準備能夠真正傳下去的東西，所以他不太肯寫，而且也不要人家代筆，除了應酬性的文章叫我代個筆外，學術性的文章就很少。……田先生對事情判斷非常之快，而且分析得很正確，什麼問題，只要跟他談了，不作聲，想一想，他馬上就能夠有答案，而且很正確，分析得很好，他是受過很嚴格的思想方法訓練的，而且他又做過很多的行政職務：做過黨部主任委員、中央黨部組織部的訓練處處長、河南大學校長、教育部次長，所以他對很多事情都分析得非常正確。」

劉真先生勤奮辦學的態度，以及對待晚輩的周到，也讓他相當地感念：

「大學實習完以後，回來當助教。當助教很忙，因為是當劉真劉校長的秘書。劉校長都是來得很早，而且常常是下了班以後，他還不走，待到晚上六點多才要走，當秘書要跟著他，所以很忙很忙。……劉校長也一樣，任何時間碰到我就要順道送我，那個時候我住在師大旁邊，我說：『校長，你不要送我好不好？到你家門口你先下車，叫司機送。』但是他總是說：『不不不！』非得要把我送到家，他才回家。……，老先生們待人真是周到！」

聽他娓娓道來師長們的風範與智慧，無論是在研究學問方面，或是待人處世方面，相信每位讀者跟筆者一樣，雖然沒有直接受教於這些師長的門下，也會有如沐春風之感。尤其，看到伍振鷺先生雖然有今日學術上的地位與成就，卻沒有因此而志得意滿，對於當初在各方面給予他教導或照顧的師長們，至今依然是滿懷孺慕與感激之情，如此的胸襟與氣度，更是值得我們學習之處。

伍、赴英留學瑣憶與省思

民國五〇代，受限於當時的社會政治因素，伍振鷺先生無法赴美進修，只好轉往英國倫敦大學。他憶及當年負笈英國的原因，也談到了求學期間愉快的生活點滴。

「我那個時候考了夏威夷的中西文化獎學金，以及傅爾布萊特獎助金，都正

取，後來哈佛燕京獎學金又是備取第一名，但是領事館不給我簽證，三次都出不了國，因為他怕我出國去不回來。後來田先生就說，這條路走不通，那就申請國科會出國好了。所以我後來就到英國去，不到美國。」

他感慨地說著當時無法赴美的緣由，但是在英國進修的期間，卻也帶給他不同的人生體驗。他用爽朗而愉悅的語調談起了這段回憶：

「我住在 Lilian Penson Hall，是一個人住一間，那個時候在倫敦算是最好的外籍學生的宿舍，有咖啡，有電話，尤其一個人住很好。所以，那些到英國去的留學生常跑到我那兒來，第一個可以打地舖，第二個可以洗熱水澡，然後我一定會請他們吃一頓飯。……我因為是教授進修，沒什麼壓力，所以後來就是到處去參觀。當地的從前舊大使館留下的人員，如鄭大使，還有自由中國中心主任請客，都是我作陪，所以大家都很羨慕我，天天吃中國餐館。但是也很浪費時間，為什麼？當導遊啊！他們一來就是要參觀牛津、劍橋，所以我一星期都要去一、兩次牛津、劍橋或者溫莎。」

在英國的生活體驗對伍振鷺先生而言是愜意而美好的，不僅與當地留學生們相處融洽，也有許多四處遊歷的機會。在學術研究上，他也有所成果與心得。在倫敦進修結束前，依規定須繳交報告給當時修業的學校，他利用六個星期的時間完成共六個章節的報告。這份利用短時間所完成的報告，後來順利地通過審查，讓人不禁佩服他的學識涵養。

伍振鷺先生在英國進修完成的報告，題為「英國教育的新趨向」，後來刊載於師大學報，內容旨在介紹當時英國的綜合中學 (comprehensive school)。一九六〇到七〇年代，那時綜合中學在英國正是熱門的關注焦點，他因此為文論述此一制度。當時英國教育體制正急遽改革，他歸國後也多有相關論述。然而，隨著作品與經驗的累積，伍振鷺先生也道出了這一段他在從事學術研究時所發現的問題：

「英國公學、英國大學、英國職業教育等，我都寫過，當時這些文章的時間性很強烈，一過時了就不行了，所以後來也沒有發表的價值了，而且我也沒有把它整理成一套體系。就是說，本來也是想一個個寫，將來寫一本介紹英國全部教育的書，可是事與願違，沒有繼續下去。」

伍振鷺先生所提及的困境，相信也令許多從事學術研究者感同身受。他提醒我們，目前許多為人所關心的子題，常是具有強烈時效性的，因此，學術研究若一味追隨流行、目光短淺，恐怕一下子便會被時代的洪流所淹沒，而失去價值。他接著提出了自己對於這種學術困境更深層的省思，由此肯定歷史研究的價值，也勉勵我們要具備「宏觀」的態度與精神，他說：

「學術研究就是要宏觀，學歷史的要培養這種態度，學那種技術性的，像課程、教法，尤其美國式的，天天變，趕也趕不完。尤其行政上的政策，像九年一貫、教科書開放等，這些東西都沒有什麼是非，也構不成學術，譬如像國立編譯館的存廢等議題也是，這只是政治上的意識形態，都不是學術，是不能存在久的，過了就沒價值了。」

從伍振鷺先生的談話中，隨處可見他對於學術研究問題的深刻體察與殷切期許，以下在先生論及現今的教育改革與研究風氣時會有更精闢的論述。

陸、從事學術研究與著作之心得

伍振鷺先生於教學研究之餘，曾編著中國教育思想史等重要的教育專著，皆是後學者必讀之書。此外，他所發表之教育性論文甚多，散見於各種學術性刊物，持論平實嚴謹，皆獲有很高的評價。

他對於教育領域的學術貢獻，早已為大家所推崇，尤其是在教育史的研究領域方面，他與我們分享了寫作「中國教育思想史」所獲得的感想：

「中國教育思想中，先秦、兩宋是重點階段，兩宋、先秦的部分整理出來，其他的就比較難了。第一個資料的份量不夠、零碎，而且也沒有系統，所以其他的後來就沒有動了。而且後來也沒時間，因為課太多了，所以也就一直沒仔細再做。研究是這樣的，創造力大概是四、五十歲的時候，是黃金時段，過了六十歲以後，…特別是眼力就很差了，所以學術界後進要努力，並且要趁早啊！」

史學研究者常會面臨到的一個難題，即是史料的殘缺，以致於缺乏足夠的理據，伍振鷺先生在寫作「中國教育思想史」時也有這種感慨。另一方面，他也感嘆自己過去因為教學事務繁忙，而錯過了從事學術研究的巔峰期，因此他期許與勉勵每一位有志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們，想要有所成就，便得即時把握與善用時間。

柒、在文化大學的經驗談

伍振鷺先生透過在文化大學設立教育學系的經驗，一方面比較了公私立大學間的差異，一方面也道出了當時的甘苦與人生態度，他以一貫爽朗的語氣回憶道：

「從表面上的感受來講，公立學校有的時候就是比較散漫，而且效率比較差、比較浪費。師大本來跟台大、清大比就是比較窮，但是跟文大比還是富得多，資源還是較豐富，那邊真是什麼資源都沒有。我到文大成立教育系，又成立教育學院，

從開始的開辦費、增班費，什麼都沒有，師資名額也少。好在因為我在師大的關係，還可以找得到人上山去兼課，否則的話那真沒有辦法。……所以現在我想離開，他們一直不肯讓我走。原因是他們知道我走了以後，運作可能有困難。」

他接著提到了自己對於整個過程的想法，以及未來的計畫：

「今天我已退休了，人家會覺得你還可以再盡點力、做點事，但是我一向是這樣的，能做多少算多少，不強求，順其自然，不一定非要有一個什麼樣的目標，達不到會覺得很有挫折感，其實無所謂。人家以為我那麼有興趣，好像永遠在那邊擔任行政助理，……我自己沒有什麼，就是有這麼一點方便，就撐一撐，但是不能長期是這樣，總是應該有一個想法或是作為，換個人就是另一個想法、另一個作為，而且，任何一個人都有走到終點站的時候，不能說非要死而後已啊！」

伍振鷺先生憑著強烈的使命感，使得文化大學教育學院在課程、人事與設備上逐漸步上軌道，運作順利。但是，他並不因此而自豪，或有所戀棧。他對於曾在過程中給予幫助的人心存感恩，對於自己未來的去留，更是展現一派灑脫、淡泊的精神與器度。

捌、對現今教育現象的體察

.....

伍振鷺先生對於現今的教育現象，無論是在理論或實務面，皆有其獨到的見解。他持平而睿智的言論，明確地道出了國內教育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，相信這正是他從事學術研究時「宏觀」思維的展現。

一、談大學教育

伍振鷺先生對於大學教育有其獨到的想法，他從各種角度來剖析國內大學的現況與問題。

對於台灣近年來廣設大學的現象，他憂心在「量」與「質」之間的落差，首先，他認為大學既是研究學問的場所，圖書設備便須力求充實。他說：

「當年師範大學的前身是日本高等學校，籌備期間，由長官公署（註：現省政府）把接收日本的一批圖書，撥到作為圖書設備的基礎。成立以後，又派人到大陸上去採購，當年師大圖書館裡面大概有二十幾萬冊書，在台灣大學裡面來講，恐怕師大圖書館的藏書量還算是第二個，第一個是台大。……後來那些新成立的大學、技術學院的圖書館有些一萬冊都不到，實在令人憂心其教育的品質。」

再者，他從美國與大陸來闡述未來大學設立的趨向，將從獨立、分化走向綜合

大學的模式，由此點出了目前國內大學的困境：

「雖然美國的大學，早期並不好，但是校園面積大，建築又宏偉，而且數量多，世界上哪個國家有三千多所大學？大陸上現在最多也不過九百多所，最近合併的也不少，因為他們一度過度的分化。像台灣的小學校已經不行了，所以現在美國、大陸上也有很多大學合併成綜合大學，從前把它拆散了，工學院、理學院……各學院都分開，現在把它再合併起來。過去浙大號稱東方的劍橋，後來中共改組把它拆散，那是受蘇俄講求專業化的影響，現在大陸還是回頭走綜合大學。大學要大，然後多，可是我們條件不夠，台灣可以設一百所大學嗎？當然每個大學都很差，因為都很小，資源分散，師資設備都很差。」

他也以美國大學在資金獲得上的優勢為例，說明了台灣與美國國情上的差異：

「美國的工商界或者私人，很願意把錢捐給學校。另外他們大學跟我們不一樣，我們的大學是非營利機構，美國的大學可以出賣專利、產業合作，學校可以在這個中間抽取利益。」

他提醒我們，由於種種教育條件與環境上的差異，因此，日後台灣大學教育若要是有所變革，想要在質量上求均衡之發展，便須有更深層的歷史與文化考量，否則一味效尤，跟著美國跑，恐將帶來更大的危機。

二、Power is Knowledge?

伍振鸞先生認為目前國內教育界瀰漫著過度泛政治化的現象，以至於形成追求真理的障礙。

首先，他談到了過分去中國化所帶來的學術上的危機，他語重心長的論道：

「國中小的教科書把對於國家的認同都抽離了，這當然是危機。今天政治意識太濃厚了，似乎是權在我手上，歷史都要改寫，聽說國史館要研究日本近代史，公務員考試要考日本史？真荒謬！……教育不要太過分的政治化，台灣現在整個情勢都在去中國化，要把『中國』兩個字拿掉，看到『中國』這兩個字就刺眼，可是，台灣把中國去掉以後還剩什麼？而且我們現在是要拿日本的歷史來代替中國的歷史，這點我是覺得不能接受。」

接著，他指陳了當今社會政治領導學術的亂象：

「其實，台灣人要獨立，政治上你可以有這個權利要求，就如同美國人爭取獨立一樣，但是你要說：『我不是中國人，跟中國一點關係都沒有。』，這話說不過去。而且你說自己與日本的關係比較密切，或是像臺大醫院的一個教授講的：『新台灣人是原住民加上荷蘭人跟日本人雜交成的一種新民族。』，這簡直是太過分

了！……，今天問題很簡單，儘管我是外省人，但在台灣已住了五十多年，在台灣已生了根，實質上就是台灣人，也不願意被共產黨統治。雖然我認為我還是中國人，台灣和中國不可分割，但那是從歷史文化、從學術的觀點來看，此外，就政治立場來講，我也反共。」

伍振鷺先生認為政治與學術有其各自的訴求與目標，而學術乃為追求真理而存在，應是講求「knowledge is power」，但是政治勢力過度介入學術領域的結果，卻往往招致「power is knowledge」的危機，學術反成了當權者散播意識形態的工具，他對這樣的現象實在憂心忡忡。

三、改變與堅持之間

「教育大辭書」是伍振鷺先生與多位學者共同完成的一部教育經典。這部克服了人事與經費困難，歷經十年所完成共十二冊、蒐羅古往今來各類教育辭目的重要參考書籍，當年由劉真先生擔任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，賈馥茗先生擔任總編輯，伍振鷺先生與楊深坑先生分別擔任副總編輯工作，並集結了許多位在教育各領域學有專精之學者，一同付出心力，才得以成就此番事業。他在闡述這部叢書之於教育界有重大意義的同時，也指出了許多人對於教育的錯誤觀點：

「過去很多人也許覺得教育界，好像什麼事情都沒做，也沒什麼好做的，但是現在他們看到，我們在幾年之內拿出這樣的一個成績出來，才知道我們不是如人所想像的。像他們那些學科學的人會覺得說：『教育有什麼？誰都會，誰沒受過教育！』，尤其那些在美國學科學的人，作事情有效率，也懂方法，馬上就可以有結果出來，他們基本上是對教育有所誤解，他們用科學的態度，要快、有效率，像作實驗一樣；有問題，失敗了再來。但是，我們學教育的不是，所以他們就批評我們學教育的保守，可是做事情就是要有擇善固執的精神。我們對教育問題要很慎重，為什麼？因為人不是白老鼠，人不可以做實驗，你無權把人當作實驗品。」

他認為當教育面臨「改變」與「堅持」的抉擇時，「慎重」是絕對必要的原則，因為教育的對象是「人」，因此主張改變時，絕不能只憑孤注一擲的激情，而盲目的群起效尤。他以法國對於自身傳統的堅持為例，提醒我們：

「法國有他們的一套，而且會堅持他們自己的一套，不像我們，法國一直覺得他們有自己的文化、傳統，他們一直在堅持，絕不受美國人影響、受德國人影響。像他們的高等師範，被認為好，就一直保持。高等師範是法國的精華，也是世界的精華，高等師範對法國的影響、貢獻真是大，我們卻輕易的就放棄掉了，所有的師範院校都要廢掉了。高等師範是法國的命脈，所以絕不改，是法國文化的精華，…

…，自然就有自尊心、自信心，台灣就是缺少這一種堅持與自信。法國人雖然戰爭打敗了，但絕沒有說我不如人家，……，法國人以爲他們自己的文化是最寶貴的，也是世界的精華，法國人就有這種自信。」

接著再以英國的教育改革爲例，指出英國最近在看似頻繁的變動之下，卻仍有他們一定程度的堅持與立場，他說道：

「英國人現在重新調整了，他們最近調整很快。英國人知道從前那一套已經不行了，現在不是人家學他們，現在是他們要跟著人家走，所以他們反而變動得很快，而且看到合適的領域，馬上就採取這個方式。爲了提昇國家競爭力，所以規定國家考試，而且在義務教育階段要四次會考，還要排名；還有教育標準局，從前是皇家督學，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，都放棄，改成教育標準局，那個制度非常功利化，並且有效率。學校接受視察，不行就告訴你要改，還是不行的話，就停止招生，再不行的話，政府接管。從前英國是尊重地方行政自主權，現在全部由中央政府掌控，因爲他們發現過去的制度不行了，國家沒有競爭力了。」

他相信有許多人見到英國的改革，會迷戀於這樣的表象，認爲進步是改變的必然結果，但是他以嚴正的語氣駁斥道：

「英國不像我們是跟著人家改，卻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要改！英國人至少知道，爲什麼改，能掌控、主導自己。我們卻不是，我們的全部跟著美國學：廣設高中大學、大學要擴大容量、獎勵私人興學，我們現在私立高中都招生招不到，大學兩年以後也招不到學生了，沒有競爭力了！」

伍振鷺先生認爲，在「改變」與「堅持」之間，無所謂絕對的對錯，但是所作的最後決定，卻絕對需要經過更深層的思維。因此，他認爲在教育改革的過程中，教育界絕不能缺席，因爲一個摒除了專業、欠缺周詳思慮與計畫的改革、一個只爲改變而改變的改革，絕對只是個未開始就注定失敗的改革。

四、不要讓人家牽著鼻子走

伍振鷺先生對於現今的學術研究風氣，也沉痛地表達了他的憂慮：

「今天，世界潮流大勢所趨呀！不可否認的，我們是邊陲，人家是核心，你不跟著他走不行。今天台灣就是說，什麼都美國化了，學術也是美國化了，我們是自然而然地走上那條路。但現在問題就是，你走上那條路以後就變成什麼？一個大機器在動的時候，你就是小螺絲釘啊！停下來也不可能，想停下來也不行，要不動更不可能。但是我們又沒有辦法學成美國這個樣子，人家是高度開發的國家，我們還在發展中，所以我們最後會就像我們的工業一樣，只能做人家的代工！」

他的話一針見血地道出了國內學術研究的問題，正如同在工業上對美國的依賴般，許多從事學術研究者也落入了相同的窠臼，成了他口中所謂的「學術代工」。因此，他引用胡適之先生的話，提醒我們：

「當年胡適之先生講說，我們不要讓人家牽著鼻子走。而我們今天台灣是什麼？自己把鼻子圈好了以後，把繩子送給人家牽，這是最痛苦的。所以，很期望我們學術界，能走出一些自己的天地來。現在似乎不可能，就好像我們的工業一樣，我們只能做美國的代工，美國不給訂單，我們就沒飯吃。我們的學術也一樣，你的文章不拿到美國去發表，誰承認你的學術地位？所以，我是希望我們能夠走出自己的一條道路來，當然這是一個很高的理想。不過就是希望現在，我們是不是可以找到有我們自己本身特色的部分，不要一輩子看著人家的臉色，讓人家牽著鼻子走！學術界總是希望說自己是第一流的，不要是第二流、第三流的，不要說自己把鼻子圈好以後，還把繩子送給人家牽著走。希望能夠做到，但是很難就是了。」

他認為國內學術界必須嘗試找出屬於我們自己的特色，才機會擺脫「學術代工」的現況，但是，他也同時道出了這其中的艱難：

「但是我們自己本身又沒這個條件哪！我們的學術界不景氣啊！誰肯捐一大筆款，說我們來做點自己的事情。就說我個人，假如有一筆錢，我就很希望可以，舉個例來講，成立一個教育史研究學會，辦一個有水準的刊物，讓人家承認你。所以你必須要有一筆錢，然後又能夠做一點成績出來，並且讓人家知道，……個人的力量雖然很有限，但是至少應該有一種認識，不是像有些人根本沒這種想法，覺得只要能夠變成美國人，被美國人牽著鼻子走，就很甘願、很光榮。」

許多人一定和筆者有相同的期望吧！希望在不久的將來，伍振鷺先生能有機會將他這樣一份理念付諸實現，讓國內的學術界能真正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。儘管這條通往理想之路窒礙難行，但是他提醒我們至少該有如此的體認與反省，因為惟有這樣，我們的學術領域才有精進與自主的可能。

玖、對教育學術與實務界的期勉

由以上伍振鷺先生對於國內教育問題的評論中，我們見到了他對教育的一股赤忱與投入，也惟有懷著這樣的一種精神與態度，才能道盡現今教育界的種種沉痾。但正如同一位誨人不倦、力求莘莘學子們能有所成就的師長般，嚴厲指陳問題的背後，是更多對於教育的關懷與期許。經過了大半輩子的行政歷練與學術研究工作，伍振鷺先生將自己豐富的人生閱歷，透過這次接受訪談的機會，分享予在教育界的

每一位工作者，希望能透過更積極的思考與作為，讓台灣的教育界，無論在理論或實務上，皆有所展進。

一、先找到自己的定位

伍振鷺先生告勉我們，要對教育奉獻己力，首先不能不對自己所處的現況有更深的自覺與反省，他說：

「第一個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哪裡，定位在哪裡。首先要找到自己的定位，再來看看自己現在的位置在哪裡，才會發現原來自己這麼慘啊！能不能想辦法改進？至少我們應該有這種認識、這種覺悟。……美國有兩百萬留學生，這些人將來回國以後都是精英、是領導份子，一定會把美國的主流思想帶回自己國家去，他要民主、他要人權，這是自然的，而且他也把美國的那種主流文化帶來了，牛仔褲、吃漢堡、喝可口可樂。美國人的文化征服世界，你不用英文寫文章、不用英文發表，管你是用拉丁文、希臘文，都白費！中文也是一樣，人家不認識，所以不承認你。現在就是說，我們中國也有這麼雄厚的文化背景，我們能不能自立自強？我們第一個要先有這個自覺，有了自覺才能夠自省，然後才能自強，才能自立。假如沒有的話，就是一輩子讓人家牽著鼻子走！靠我們的政治界或者其他方面，都是沒有辦法的，假如學術界不能從這條路開始的話，那我們將來是萬劫不復啊！」

我們先要有找尋自己定位的自覺，從中自省，然後自強，最後才能自立。伍振鷺先生深切地期盼著國內學術界能凝聚這般共識，並將它化為一股追求自主與獨立的力量。因此，他又這樣說道：

「第一個，能夠從自己做起，做一點算一點，不可能一下子期望太高，而且我們從事教育工作，不可能有赫赫之功。就是要累積，慢慢的來，假如大家有共識，都說從我自己做起，慢慢地做，也許總有一天會做出一點成績出來。」

教育理想非一蹴可幾，因此，伍振鷺先生但求每個人首先皆能反求諸己，為教育貢獻自己的一份心力。

二、從歷史尋根

伍振鷺先生認為現在談論教育問題、從事學術研究，許多人面對一波波的教育潮流，追求時興、隨波逐流的結果，卻也往往迷失在其中：

「我們中國近代就是學人家，而且常常改。今天來講的話，其實研究什麼課程啦、教法啦，跟著美國人走，那是天天變，而且那東西過兩天就過時了。基本上來講，還是要研究歷史、哲學，才是真正的根。你談中國古代的教育，為什麼是那種

教育？英國爲什麼從前有雙軌制？這都有它的時空背景啊！沒有擺在時空的背景下你會不了解，而且那個才是根！否則的話，像今天（台灣）的改革，今天改，明天改，說不定過兩天又有人要改變它了。」

所以，他告訴我們一定要先從歷史上去找根，追本溯源，如此才能在變動不居的時潮中，洞見問題的癥結，找到自己的出路：

「所以我們今天學歷史的，一定要弄清楚時空，這其中的因素我們一定要把它掌握正確。你不掌握正確，窮究知識的結果，就等於是用自己甚至別人的觀點來解釋。你一定要把它落實在時空裡面去解釋。所以我想歷史總是個根，這個根不能用你自己的主觀因素就把它否定掉，這是沒有辦法的，因爲這是真理啊！台灣從歷史上來講，跟大陸就是有很密切的關係，但這密切的關係不代表政治上主從的關係，那是政治上的事情。台灣自己本身有自己政治系統，在政治上有權要求獨立，但是不能因爲政治上要求獨立就要否定歷史，我想這就不符合真理。所以我說，你要台獨你就台獨，我不是你，我們的政治立場不一樣，我不能說是你錯，但是你要說自己不是中國人，台灣跟中國從來就沒有關係，這個是錯的。」

伍振鷺先生的一席話，處處是令人激賞的智慧結晶！的確如此，面對現今的教育，因受到各種意識形態與利益衝突所引發的問題與對立，惟有回歸歷史、真正的學術研究上來檢視，才能摒除掉各種加之於外的意圖與干擾，還原教育真正的面貌。

三、理解變動的時空因素

伍振鷺先生除了告訴我們歷史研究的價值，提醒我們須從歷史尋根的重要性之外，更進一步地依此理念，分析了中外教育現象背後的歷史脈絡，他首先提到了英國近代教育急速變革的時空背景，他說道：

「我想教育它的變化，是有它的時空跟因素。你一定要去理解這個時空交錯的背景之下，否則的話就是漂浮在上面，看它的變化很快，反而眼花撩亂。英國來講，變化快是因爲與過去的背景不一樣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，英國人才發現自己已經不是世界的主流，現在反而要去跟別人、趕別人，從前都是別人跟著英國，從前世界最先進的都是英國人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對英國人刺激很大，從世界第一流的強國，變成世界第二流的國家，就是因爲這樣的歷史背景，所以在教育上必須要改。雙軌制已經不適合民主潮流了，假如英國再繼續抱殘守缺，那更慘！因此必須要改，而且速度都要加快，像從前那樣慢慢來不行了。」

他接著又再針對中國的教育現象加以剖析：

「所以，你一定要了解這個時空背景。我們中國古代的教育，為什麼是那樣的？它有它的時代背景。像上古時期的學校，教育本身有階級性，社會本身也有階級，尤其周朝封建制度，那社會階級是非常之明顯，所以它必定有教育制度的階級性。舜設教育官，司徒是教一般平民，夔典樂是教貴族子弟，是兩套；周朝也分得很清楚。所以一定要把這個時代背景、時空因素掌握住，若不了解時代背景，就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。我們中國近代的教育，之所以老是變來變去，而且常常是大量的改，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根，把中國過去的全部都改，然後來學人家。第一個學歐洲，歐洲學了以後，學日本，民國十一年又一下子改過來學美國，變動頻繁而且非常快速，包括我們這次台灣的教改也是。這次教改是要脫胎換骨，連精神上都要全部要學美國，但是缺乏對中國歷史文化背景的了解。我們跟美國比，怎麼比？所以我就常常講說，我們學美國，學得好嗎？學得像嗎？不可能。我打個比喻，為什麼我們不能學美國：英國人跟美國人關係很密切，我們的關係有沒有美國跟英國的關係密切？當然沒有。可是美國人獨立以後，他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教育制度，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學美國？……即使學得像，也只有永遠讓美國人牽著鼻子走。」

藉由這番話，他語重心長地提醒我們，倘若繼續欠缺對於歷史文化背景的反思，我們將永遠只能作為時代潮流的追隨者，想要真正主導自己，則是遙不可及的夢想。

拾、尋根探源，作教育的掌舵者

伍振鷺先生的言談，對現今學術界而言，雖是一記當頭棒喝，卻也讓我們看到了通往夢想與希望的一條路。他期許我們：要從找到自己的定位開始，自我反省，體察時艱；進而，由歷史的脈絡去探尋根源，藉以洞澈思維，瞭解事件變動的時空因素，真正認清我們的問題與需要。這條路或許走來困難重重，卻是達成理想的必經之路。期望大家能一同共勉與踐行，因為，唯有經歷如此深切的自我覺察與奮鬥過程，才能在變幻莫測的時代潮流中，掌舵我們自己的教育、文化與學術生命！

主要著作

旅英散記。台北市：台灣商務。

教育概論。台北市：華視。

先秦諸子教育思想。台北市：偉文。

兩宋理學教育思潮。台北市：偉文。

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。台北市：三民。

亞洲大學的發展——從依賴到自主（主譯）。台北市：師大書苑。

中國教育思想史（先秦部分）。台北市：師大書苑。

中國教育思想史（兩宋部分）。台北市：師大書苑。

教育行政專論（主編）。台北市：南宏圖書。

英國的公學。台北市：五南。

教育評鑑（主編）。台北市：南宏圖書。

教育哲學。台北市：師大書苑。

中國教育史論叢。台北市：師大書苑。

教育哲學（合著）。台北市：師大書苑。

新教育概論（合著）。台北市：五南。